



# 一面永远不朽的历史明镜

——重温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 杨玉梅

关于《四世同堂》，老舍说：“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在这部长达百万字的鸿篇巨制中，老舍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北平沦陷八年间小羊圈胡同各色人物的生死沉浮。重温《四世同堂》，通过鲜活的文字走进那段苦难的历史，体验沦陷区人民的挣扎、屈辱与死亡，感受作者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对人性复杂及国民劣根性的深刻剖析、对战争罪恶的严厉批判，具有特殊意义。

## 国破家亡的深重灾难和战争的罪恶

小羊圈胡同祁家四代人物的命运遭际，是抗战时期中国家庭命运悲剧的缩影。祁老人是小羊圈胡同的标志性人物，“他是这一带的老人星，代表着人口昌旺，与家道兴隆”，他见过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看见清朝皇帝退位和持续不断的内战。他认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诸事大吉，由此信守“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关上大门，就用不着害怕”的“封闭哲学”。然而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蹂躏下，他的梦想幻灭了，生活每况愈下，饥寒交迫，家破人亡。儿子祁天佑是一个安分守己、正直的生意人，始终坚守“饿死不做亏心事”的底线，无法忍受侮辱而投河自尽。长孙祁瑞宣，正直善良而又软弱忍让，他意识到应当去抗战，可他是大家庭的顶梁柱，不得不留下来忍辱负重地尽孝、挣钱，维持生计。因不愿意为日本人做事，到英国府工作而被抓。出狱后，他反复念叨：“亡国就是最大的罪。”祁瑞宣的媳妇韵梅，勤俭持家，可是不论她怎么努力都无法填饱家人的肚子，眼看女儿姐姐被活活饿死却也无可奈何。在饥寒交迫中，祁老人祈求老天爷收走自己，留下姐姐，祈求也是枉然，即便即将到来的胜利也无法挽救姐姐的生命。最后实在没有可吃的，姐姐咽下一口共患难，然而共和面里的沙子、谷壳卡在阑尾里，引起急性阑尾炎。小说描绘姐姐临终的状况：“她肚子阵阵绞痛，仿佛八年来漫长的战争痛苦都集中到这一点上了，痛得她蜷缩成一团，浑身冒冷汗，旧裤子、小褂都湿透了，她尖声叫喊，嘴唇发紫，眼珠只往上翻。”姐姐就这样痛死了，她是祁家最年幼的一代。孩子象征着家族与民族的未来，姐姐之死意味着战争不仅摧毁了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更在扼杀民族未来的希望，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残酷的描写，正是对侵略者罪行最沉痛的控诉。

而成千上万的学生被迫到天安门游行参加庆祝保定、上海、武汉、南京、长沙等城市沦陷的大会，侵略者甚至要求中国人和中国学生到天安门前向侵略的阵亡将士鞠躬致敬。这些何其荒唐！“北平的一切已都涂上了耻辱与污垢！”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推行奴化教育，迫害知识分子，随意抓捕、拷打、屠杀无辜百姓，一幕幕人间悲剧，深刻揭示出日本侵略战争的罪恶及其灭绝人性的反人道主义本质。

## 深刻的批判和反省

作品中的小羊圈胡同位于今北京西城区护国寺附近，后改名为小杨家胡同。护国寺始建于元代，“护国”二字本承载着“庇佑国祚”的美好愿望，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也是民众精神寄托的重要场所。战争使得这个地方变了模样：小崔头颅悬挂在寺前槐树，

《四世同堂》中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让历史充满血肉，映照出中华民族从战争走向和平的艰难历程。重读《四世同堂》中代表性人物的命运及其承载的思想内涵，能让当代读者更深刻地铭记历史，激发深植于血脉中的家国情怀、民族精神与责任担当



《四世同堂》插图 丁聪作

饥民饿毙于庙墙之下，寺庙成为临时的停尸处；僧人被迫为日寇阵亡者诵经超度，被撕毁的经卷用作生火纸；祁天佑在投湖前也曾驻足护国寺，却并未获精神救赎……

作者以细腻冷静的笔触描绘北平市民中存在的保守、麻木、怯懦、苟且偷生等行为。比如，祁老爷善良却保守，不关心政治，对国家危亡漠不关心，只是以“四世同堂”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荣耀，对祁瑞宣未经他的允许而放走老三感到不满。抗战结束后，他对重孙小顺子说：“只要咱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即使我死了，你也得活到我这把年纪，当你那个四世同堂的老祖宗。”科学家牛教授因畏惧死亡和贪图个人利益，选择与日本人合作，担任教育局长。陈野求为了养活8个孩子和病妻被迫为日本人工作，经受良心、耻辱与生存困境的煎熬，只能依靠鸦片麻醉自己。作品中还有形形色色的汉奸，他们成为侵略者统治的帮凶，成为民族苦难记忆中最令人痛心的内部伤痕。比如反面典型人物冠晓荷，因未获国民政府官职而痛恨国家，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和同胞性命。他的妻子大赤包自私贪婪，为升官发财不择手段，最后惨死狱中。

老舍对这些丧失民族气节、为虎作伥的丑恶行径进行无情的剖析和批判，也是对民族性深刻而沉痛的自省，具有强烈的警世意义。

## 对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的讴歌

在暗无天日的沦陷区，北平涌现出一批坚守民族气节、默默抗争的人物。比如祁瑞宣虽然处在忠孝两难的挣扎斗争中，但始终坚持不事敌、不合作，积极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抗战，教育并唤醒学生的民族意识。韵梅虽然没有文化，却善良、温顺、坚忍，在苦难中呵护一家人的生活，在艰难中求生存，省下口粮接济邻居，对同样受难的日本老人，也报以同情和理解。还有李四爷夫妇、剃头匠孙七、车夫小崔、程长顺等普通百姓，在艰难时刻守望相助，他

们身上闪烁着未被战争磨灭的道德光芒和人性之光，像民族精神的火种，生生不息。

钱默吟在国仇家恨的打击下，从一名隐逸者蜕变成一位坚韧不屈、奔走呼号的民间斗士，展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英勇无畏的精神。祁瑞全代表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反抗。北平沦陷后，他拒绝接受伪教育，毅然离开北平，投身抗日洪流，经历战争洗礼后逐渐变得成熟坚毅，成为地下斗争的积极骨干。高第对父母汉奸走狗的行径极为反感和鄙视，对正义和公理有着朴素的维护，在家庭遭遇变故后，她勇敢、自强的优秀特质逐渐显露，最后走上抗日革命道路。这些在民族危难中的勇于抗争、不畏牺牲、充满爱国思想的人物，是黑暗中支撑国家希望的“沉默的脊梁”。

《四世同堂》也刻画了善良的普通日本人形象，这在搬进1号院子的日本老人身上得以集中体现。她善良而理智地认定日本必败，希望日本人因失败而悔悟，把他们的聪明与努力都换个方向，用到造福于人类的事情上去。这个人物形象的出现别有意味，体现中日两国普通民众所共有的善良、正义，巧妙地将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与同情普通日本民众区分开来，也展示了世界人民超越民族仇恨、追求和平的共同渴望。

《四世同堂》中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让历史充满血肉，让亡国之恨具体可感，成为一面永远不朽的历史明镜，映照出中华民族从战争走向和平的艰难历程。同时，《四世同堂》也是一部充满血泪的和平启示录，警示我们真正的和平是通过巨大的牺牲和坚忍不拔的抗争精神才能获得的。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才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军民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遇难人数超过2000万，付出了巨大而沉重的代价。作品告诉我们，只有铭记历史，砥砺自强，坚守正义良知，凝聚民族精神，才能捍卫和平，才能让“四世同堂”的幸福图景不再破碎，让世界沐浴于和平阳光之下。

(作者系《民族文学》副主编)

## ■ 声 音

优秀的诗歌作品会在纵横两极追求的坐标点上出现，纵轴的追求是精神的高度，横轴的追求是语言的精度，纵横交错之处可见精品。

中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代表着东方诗歌抒情艺术的高度，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代表着西方诗歌叙事艺术的高度，中国先秦文学与欧洲古希腊文学一开始就把诗歌精品锚定在精神高地之上。数千年以降，时光冲刷了无数诗歌作品，那些冲不走的都是佳作，在岁月辗转中流传人间。诗歌的精神高度是理想的光环，是价值的追求，是正能量的凝聚，是人格魅力的闪耀，是持续不断的创新。只有在精神高地之上，诗歌才能展现积极的人生姿态，才能净化人类的心灵，才能照亮时代和未来。以大心境陶冶大时空，诗的精神就可以得到各自个性的展现，站在诗歌的精神高地，才能欣赏到美丽的高原风光，更能追寻神圣的高峰景色。

语言是诗意的载体，新诗运用现代汉语打磨诗意，必然追求语言的精粹。语言的张力不仅产生于表层语词的搭配，更实质的是“写什么”与“怎么写”之间的辩证统一。诗歌不会满足于通用词汇的使用，往往通过颠覆传统话语，激活潜在词性，重新命名万物，创造新的词汇。语言的历史长河总是汇进人类智慧的汪洋大海，其间有许多优秀的诗人不断创造新词汇，为语言脉流作出丰富的贡献。诗歌语言肩负的不是说明的义务，而是呈现的使命，其天性是暗示，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真正的诗歌作品的每一行诗句，都是有意味的，经得起反复咀嚼。语言的所指与能指为诗人提供了词汇组合的巨大空间，汉语的复义特征更为现代汉诗创作提供无限的审美可能。诗人的情感靠意象呈现，意象靠语言表达。采撷怎样的意象，取决于情感的需要，意象要适合情感，意象与情感相互融汇，多一分不妥，少一分不成。语言必须与意象的律动相匹配，实词准确呈现视听味触嗅五感的具象特征，虚词有效补充意象丰富的面貌，这样的诗歌语言来自大心境的剪裁和大技巧的运用。

想要创作出诗歌精品，精神的高度与语言的精度这两个追求缺一不可。一味追求精神高度而不锤炼语言，或只锻造语言的精粹却不着眼于精神的高尚，都不能创作出真正的诗歌精品。顺着纵轴攀缘，沿着横轴延伸，精神与语言二者的交集融合拓展了丰富而驳杂的诗歌世界。

(作者系福建省作家协会顾问)

## 精神的高度与语言的精度

□ 黄莱笙

## ■ 短 评

# 幽蓝之境的生命风景

——雷默长篇小说《水手》论札

□ 马 兵

雷默在写作《水手》(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时“曾试图用不同的颜色来结构这部长篇，而来自太平洋深处的迷人气息确实一直萦绕在我周围，这是一种神秘莫测又令人心驰神往的氛围”，虽然小说并未如此呈现，但对色彩的敏感还是保留了下来，比如小说第一章“幽蓝”赋予大海更深沉、玄远、神秘和悲郁的气质，也符合主人公在横跨太平洋的两年漂泊中所领略到的别样人生况味。

讨论《水手》绕不开“海洋书写”，雷默也期待用这部作品为中国当代海洋文学贡献一份力量。40多年前，以王蒙《海的梦》、邓刚《迷人的海》等为代表的一批小说，让作为特殊“风景”的大海成为新启蒙意识结构中的重要意象，激发一代人想象远方的热情，也包含一种与时代共振的现代性追求，被辽阔的浩瀚大海疗愈，或者强劲地与大海相搏，这样两种写作实践以及它们的相互转化一直绵延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海洋书写中。面对已成范式的写作传统，雷默是有取舍的：一方面，他从更广阔的世界海洋书写中汲取营养，受益良多。阅读《水手》的不同章节，会让人想起一些经典之作，比如皮埃尔·洛蒂的《冰岛渔夫》、显克微支的《灯塔看守人》、康拉德的《“水仙号”的黑水手》等；另一方面，他写以海为家的人，却不把大海过分美化为崇高精神的原乡，写与海的搏斗并不格外张扬水手们昂扬的生命意志，而是理解并尊重他们的疲惫，以“去英雄主义”的理解和丰富的细节写出海上谋生的肉体艰困和精神损耗，也写出了这些艰困与损耗之于个体成长的意义。

小说12章大致可分成5个单元：王武之死、

科斯特岛的停泊、钓鱿鱼、秘鲁之恋、归国之思。5个单元让叙事者见证了生离死别、相逢错过，各种接踵而来的“不确定性”给“我”上了最生动的人生之课。小说转入航行后，即加快叙事节奏。老水手王武甫一出场，其人设很像是引领“我”的一个导师，是成长小说叙事中的核心角色，然而死亡迅疾发生，在风暴之夜，王武舍命救回了“我”，彻底地把“我”从对远航幼稚的梦想中拉出来。对“我”最大的触动不是他的死亡和海葬，而是海员们迅速将注意力从一个人的死转到“鲨鱼宴”，“我”惊讶地发现，王武已经从他们的脑海中提前消失了，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风暴过后的大海变得“异常宁静”，“我”对大海的壮美和无情也终于有了宿命的感悟，一切就像康拉德在《生活与书信笔记》中写到的那样：“在诗歌和散文中，有那么多的省略号以它的伟大和神秘为主题，而这些人们却从来没有深入了解到这片海或那片海。大海是不确定的、任意的、无特征的、狂暴的……它的宁静中有一种空虚，它的愤怒中有一种愚蠢，那是无尽的、无边的、执着的、徒劳的……”在科斯特岛，“我”还结识了纳古灯塔的看守人庄老头，他像规划一场盛宴那样规划自己的葬礼，老人的“慈祥和智慧”是因为见惯了风暴和死亡，但本质上与那些王武死后转去讨论美食的水手没什么两样，人事的微茫更显出海洋的亘古如斯。这些给予“我”教诲的人，是从大海那里领受了终极的教诲。这不由让我们想到康拉德的墓碑上镌刻的斯宾塞的几句诗：“劳累后的睡眠，暴风雨后的港口，战乱后的和平，生命后的死亡，这是最大的快乐。”

生命如此，爱情亦然。无论滞留在科斯特岛

红灯区并和当地人结婚的镇江女人的经历，还是我在秘鲁码头与杨丹邂逅后发生的无果恋情，抑或船长、大副，以及庄老头女儿各自充满隐痛的人生过往，没有一个有堪称圆满的收束。小说在讲述这些情感故事时，笔墨是粗线条的，却自带有一种深沉的生命喟叹，那些对残缺情感的诘问和不驯最终在苍茫的海面上消散。小说在每一段情感的故事之后，都会有一段对海的风景描写。大海容纳了生命体验中美与痛的种种矛盾，并对它们一视同仁，而大海这种与主体情感结构高度关联的“风景”的频频呈现，正见证了一个具有“内面性”的水手蜕变成长的全过程。

小说的结尾也是饶有意味的。远航的轮船即将报废，水手们在大副的带领下重聚港口，船舱报废场“到处都是铁锈，有的铁锈从船体的油漆剥落处挂下来，像船的眼泪”，“我们的”船被气割机拆卸得七零八落，就在那一刻，船长“悲怆而倔强”的身影也定格下所有水手们的不舍。在回去的路上，车子要经过一段海底隧道，时间变得沉滞，一直到阳光重新透过车窗，我们仿佛是“从时间的无情流逝中，从生命的短暂阶段中，攫取片刻的勇气”，然后眼前举起“被拯救的碎片”。成为一名水手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以海为维度不断调控自我对世界和生活的认识，是知觉对时间和空间的海洋化重构。一艘船就是一座浮城，也是水手们的一座围城，他们的生命风景摇曳在出海与返回之间，在悬浮与沉实之间，在漂泊和定居之间，在失望与等待之间，在恐惧与勇毅之间，在生与死之间，在虚无与充盈之间，在倦怠与倔强之间……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 散文研究的执着

——读王必胜《矮纸闲草》

□ 肖复兴



《矮纸闲草》，王必胜著，作家出版社，2025年7月

## ■ 评 论

当今，毕其功于一役，专注研究散文创作与理论的人不多。如王必胜一样30余年坚持追踪散文创作，并写下众多评论、批评和研究文字的评论家，较为少见。

最早引我注意的是20多年前看到他编选的一本散文年选本，与很多年选本不同，所有篇章都是他亲自遴选而出。散文量大，广搜博取，不仅需要精力、耐力，更需要眼力。不少年选本并非选者亲自筛选，有的只是由名家自荐，“剜篮子就是菜”，草草堆盘而出。后来，看到他在一篇散文年选本的序言中写道：“作为编选者有一个恒定的标准，一个‘自以为是’的散文创作面貌的判断，是不能缺少的。”他有自己明确的原则，方能做到选本“不负年度称谓”。这让我想起上个世纪60年代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散文年选本，由作家周立波编选，所有篇章都是他亲自选出，并写下一篇很长的序言，对所选重要散文进行细致的点评，给出选文之所以被选的值得信赖的理由。王必胜秉承前辈传统，难得可贵。

读到王必胜的新书《矮纸闲草》，自然很有兴趣。30余年关于散文说的文字，都在这本厚厚的书中。用他在书的前言所说：“这是一个散文研究者的执着心得”，执着二字，滋味不尽。

在这本书中，我最感兴趣的在于这样两部分，一是他如何认知当前的散文创作现状，二是他如何批评指陈当前散文创作的问题。

对于当前的散文创作，他不止一次强调其价值与意义。他说：“散文，大众化的文体，也是最能反映一个时期文学与社会联系的文体。”它“与时代同行，与生活同道，与文学同行。”他进一步说：“时下的文学何为，唯散文担当”，因为散文能够“认知一个时期的文人精神”。同时，他又直率地说：“在人们对文学期望值有下降，文学不断边缘化之时，它实际上支撑着文学的希望大厦。”

如此评价散文对于文学、对于时代与社会的双重作用和价值，可以看出他对散文的重视，也说明他对散文研究的兴趣与信心所在。置于文学整体背景下，对于散文与其他文体差异性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可以让关于散文的定义变得更加清晰，让散文的边界和在文学中的位置变得更加明确。他认为主要有这样三点区别：“散文负载的是情怀，不以情节为主，但求意味隽永”；“散文是作者主观悟性的文学体现，最能考验作者文学情商”；“散文表达的多是某种可以言说又可以意会的一种情景，一个场景，一个情怀”；就散文的真实性与虚构类文体的虚构性进行对比，“小说等虚构文学的真实性是‘能指’，散文的真实性是‘所指’”。对散文的真实性，他在《守护散文的真实》等多篇文章中反复提及，这是散文创作的“铁门槛”。这些评说对于厘清散文创作的理论问题有所帮助，对散文的写作者也会有所提示和警醒。

基于他30余年编选散文年选本的海量阅读，方才能够有的放矢地梳理散文脉络，一箭中靶地指陈问题。这是时间积累的经验之谈，知味之谈。正因有这样的理论支撑，他才会对当今几近泛滥的散文乱象有清醒的判断和批评，他认为当今散文创作整体“平稳而平庸”，并明确批评这样几类散文，即专题性的长篇散文、游记散文、纪念性文字、赶时髦歌颂体文字，认为它们“内涵苍白，内蕴寡淡，难以卒读”。他近乎严苛地批评当下一些散文作者“语言上乏善可陈”，重视和研究语言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竟成为散文以及时下诸多文学体裁提高水平的急务，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他谈到有不少散文作品缺乏“人文情怀，社会良心”，而这也恰是“散文的筋骨”。而且“散文的批评滞后，几乎阙如”，纵观当下的散文批评文章，几乎“没有现象性、问题性的论述，更没有理论上的探讨和直率的批评”。尽管这些批评委婉，点到为止。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散文“热闹而芜杂，体量上庞大，创作者众，精品力作少。如何评价，是言人人殊，欲说还休”。他毕竟开了一个批评的头，值得作者和读者一并思考。自然，我是很希望他能够既说还说的。这本书集中的只是断章短简，有他30余年的雪泥鸿爪，便有了时代留下的包浆，其中丰富而独家的材料，重新整合，集腋成裘，写成一本更为完整的当代散文研究的理论著作，也是未来值得做的工作。

在《矮纸闲草》中，有一篇最长的文章《读写他们》，是他编选《小说名家散文百题》的收获。其中有与众多小说家的书信往来，也有小说家写的散文观，许多一手材料，丰富有趣，见性见情。其中池莉说的“肚脐眼散文”，汪曾祺说的“散文写人物”，我就非常感兴趣，觉得他们说得简洁又重要。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里想，作为散文研究的执着者王必胜，从中提炼出有趣有意味的筋骨，结合他对其他散文作者的研究，“纵观文坛，历览散文花园”，评说并研究当代散文发展轨迹、状况和现象，再做毕其功于一役的努力，肯定会写成一本更为厚重的大书。

(作者系作家)